

# 選編者導言

林子淳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 一、早期崛起背景和經歷

潘能伯格 (Wolfhart Pannenberg, 1929-)，中文翻譯有潘嫩貝格、潘南伯、潘南堡、潘能博、潘甯博、潘能伯、潘內伯格等) 是德國在二戰後崛起的一代基督新教神學家，與莫爾特曼 (Jürgen Moltmann, 1926-)、雲格爾 (Eberhard Jüngel, 1934-)、紹特 (Gerhard Sauter, 1935-) 等齊名。<sup>1</sup>潘能伯格著作等身，最主要的學術職任是由一九六七年起參與組建慕尼黑大學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新教神學系和普世研究所 (Zentrum für ökumenische Forschung)，並任該所所長，直至一九九四年榮休。據該系在網上公佈的潘能伯格一九五三年至二〇〇〇年發表作品清單，竟達六百四十五項之多，<sup>2</sup>已譯為漢語的有《天國近了——神學與神的國》、<sup>3</sup>《人是甚麼——從神學看當代人類學》、<sup>4</sup>《神學

---

1. 他們的簡介可參莫爾特曼編，盧冠霖譯，《我是如何改變的》(香港：道風書社，2006) 中的有關篇章。

2. 參 <http://www.st-foe.evtheol.uni-muenchen.de/personen/pannenberg/publikationen/index.html>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登入)。

3. 潘寧博著，鄧紹光譯，《天國近了——神學與神的國》(香港：基道書樓，1990) [譯自 *Theolog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9]。

4. 潘能伯格著，李秋零譯，《人是甚麼——從神學看當代人類學》(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4) [譯自 *Was ist der Mensch? Die Anthropologie der Gegenwart im Lichte der Theologi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2]。

與哲學——從它們共同的歷史看它們的關係》<sup>5</sup>和《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從施萊爾馬赫到巴特和蒂利希》。<sup>6</sup>由於在以上漢譯著作中已載有一些導言，<sup>7</sup>並且潘能伯格的〈神學自述〉<sup>8</sup>和一些介紹他生平及整體思想的文章亦已相繼出版，<sup>9</sup>故本書既為其早期神學著作的選編，以下會主要集中介紹潘能伯格的早年經歷和思想。

在二戰後崛起的新一代德國神學家，包括潘能伯格、莫爾特曼、紹特、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 1928-）等在思想上都不約而同地朝着盼望這個方向走，也曾針對上帝在歷史中的參與，尤其在耶穌基督身上的作為作過深思。潘能伯格在一九五八年起更與莫爾特曼在烏帕塔爾（Wuppertal）的教會大學共事三年，並分別發展出各具特色的終末論神學，向他們先一輩的神學大師如巴特（Karl Barth）、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和蒂利希（Paul Tillich）等作出挑戰。與莫爾特曼不同的是，潘能伯格雖也深受《聖經》的信仰傳統所影響，但由始至終都很著意地與不同的哲學思潮進行對話，這跟其成長背景和研習志趣不無關係。

按照潘能伯格自己的說法，他成長於一個沒有宗教氛圍的家庭裏，十五、六歲時便閱畢尼采的所有作品，對基督教的認識最先也從那裏而來，並對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感到着迷。戰後恢復學習時，潘能伯格因受一位教授德國古典文學的基督徒老師影響，立志將來在研讀哲學之外必須涉足基督教神學，甚至要成為神學家。一九四七年春天潘能伯格進入東柏林的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攻讀哲學和神學，對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的著作甚感興趣。及後因哈特曼轉往西德的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任教，潘能伯格也在隨後兩個學期跟他上課和參與研討班。可是由於哈特曼乃一位無神論者，潘能伯格最終沒有追隨他，而在獲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獎學金往巴塞爾大學（Universität Basel）的一個學期進修中遇上了雅斯貝斯（Karl Jaspers）。雖然潘能伯格對他的評價不太高，卻指出其把人類實存視為跟超越有關的說法對他頗有啟發。到了一九五〇年，當時就讀大學四年級的潘能伯格來到海德堡大學（Universität Heidelberg），碰巧洛維特（Karl Löwith）在訪學並教授歷史哲學，從現代哲學對歷史意義的探討回溯至奧古斯丁和《聖經》的根源去，<sup>10</sup>潘能伯格深深感受到這與拉德（Gerhard von Rad）所談的《舊約》神學有共振作用。<sup>11</sup>潘能伯格後來在慕尼黑大學數十年來都定期講授「神學與哲學」這課題，在退休後把手稿結集成書時更題獻紀念他的三位哲學老師：哈特曼、雅斯貝斯和洛維特，可見他們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

5. 潘能伯格著，李秋零譯，《神學與哲學——從它們共同的歷史看它們的關係》（香港：道風書社，2006）〔譯自 *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 Ihr Verhältnis im Lichte ihrer gemeinsamen Geschich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6〕。

6. 潘能伯格著，李秋零譯，《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從施萊爾馬赫到巴特和蒂利希》（香港：道風書社，2010）〔譯自 *Problemggeschichte der neueren evangelischen Theologie in Deutschland. Von Schleiermacher bis zu Barth und Tillich*;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7〕。

7. 參李秋零教授在《神學與哲學》和《近代德國新教神學問題史》中的〈中譯本導言〉。

8. 潘能伯格，〈神學自述：我的智性追求〉，載莫爾特曼編，盧冠霖譯，《我是如何改變的》，頁 142-157。

9. 施韋貝爾著，〈潘能伯格〉，載福特著，董江陽、陳佐人譯，《現代神學家——二十世紀基督教神學導論》（香港：道風書社，2005），頁 177-201；郭鴻標，〈潘能博的神學思想及其對華人宗教文化處境的啟迪〉，載賴品超、郭鴻標、龔立人著，《柯布、潘能博、侯活士與當代華人處境》（香港：信義宗神學院，1999），頁 51-92。

10. 這看法的具體反映於洛維特著，李秋零、田薇譯，《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

11. 潘能伯格，〈神學自述：我的智性追求〉，頁 144-145、148-149。

除了哲學的背景外，我們也必須注意潘能伯格平行地發展着的神學探究。在哥廷根期間，潘能伯格除了受業於哈特曼外，也是戈加騰（Friedrich Gogarten）的學生，並在參與「伊萬（Hans Joachim Iwand）對路德的了解」課程時，被安排負責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題目，其關於司各脫（Duns Scotus）之預定論博士論文和探討中世紀類比觀的教授資格論文都屬於此領域之內。當然，不得不提的是巴特這位二十世紀新教神學泰斗對他的影響。潘能伯格在巴賽爾小停時曾遇上他，上過他的研討班和到他家探訪。潘能伯格在這以前已讀過他《教會教義學》（*Kirchliche Dogmatik*）出版了的三卷，後來的論文指導老師施林克（Edmund Schlink）也屬信義宗內的巴特派學者。然而潘能伯格對巴特喜用的類比法很不以為然，也覺得其對上帝和啟示的討論缺乏哲學上的嚴謹性和準確性，甚至曾當面批評過他，可是潘能伯格仍認為巴特的三一論觀點正是他和當時代的學界所需要的進路。<sup>12</sup>這些對他後來在海德堡繼續學習和在學界崛起不無關係，因為在那裏潘能伯格除了研究中世紀哲理性的預定論和類比觀外，更如以上提及遇上了拉德。據潘能伯格憶述，他以往對《聖經》詮釋不太關注，惟拉德所闡釋的那位在歷史中「行動着的上帝」卻深深打動了他，並與洛維特的歷史哲學產生共鳴。沿着這條路線，潘能伯格不單感到探討以色列子民歷史經驗，並與其行動相關的應許和實現的重要性，更讓他有興趣從猶太天啟主義、《新約》和早期基督教來檢視它們之間是否有相應的歷史神學關注。<sup>13</sup>海德堡大學除了是潘能伯格求學之處外，在他受聘於烏帕塔爾教會大學教授以前也在這裏當過編外講師（Privatdozent），期間他開設了一門現代新教神學的

12. 同上，頁 147-148。

13. 同上，頁 148-149。

課程。很多評論者都認為潘能伯格思想深受黑格爾的影響，但他則稱自己從未真正成為黑格爾主義者，而他對黑格爾思想的關注則是從講授這門課開始的。除了因黑格爾創制了一個極其精密的思想體系外，潘能伯格更認為他有一個非常接近基督教的上帝觀，只是其一些基本的假定是他無法接受的。<sup>14</sup>

當然，當時關心以上一些重要神哲學議題的肯定不只潘能伯格一位年輕研究生，因此一群在海德堡研習的學生便自發組織起來，當中包括了專治《舊約》的羅爾夫·倫托爾夫（Rolf Rendtorff）、神學與歷史的特魯茨·倫托爾夫（Trutz Rendtorff）和《新約》的維爾肯斯（Ulrich Wilckens）等。<sup>15</sup>他們把拉德的《舊約》神學概念引伸至神學科系中的不同範疇，尤其注入歷史哲學的關注。這個「海德堡圈子」（Heidelberg Circle）的討論成果在一九六一年以《啟示即歷史》（*Offenbarung als Geschichte*）為書名出版，<sup>16</sup>「馬上在頗為沈寂的德國新教神學圈子裏，引起一時的震動。該論文集……被神學界恰當地理解為一股新神學概念的方案式宣言」。<sup>17</sup>潘能伯格既為這作品的牽頭人，故有時這小組甚至被逕直稱為「潘能伯格圈子」。然而這書出版時其實已距離各人的研究生階段有一定時日了，不過他們為要面對批評和為其立場辯護，使討論延展至幾乎整個一九六〇年代，而這也是本書選編大部分文章的寫作時期。因此往下我們在介紹本

14. 同上，頁 145-146。

15. 最終一同出版著作的只有他們四人，但這圈子應也包括勒斯勒爾（Dieter Rössler）、埃爾策（Martin Elze）、科赫（Klaus Koch）等，參Daniel P. Fuller，〈新的德國神學運動〉（A New German Theological Movement），載《蘇格蘭神學學刊》（*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19 [1966]），頁 160-175。

16. Wolfhart Pannenberg, Rolf Rendtorff, Trutz Rendtorff & Ulrich Wilckens，〈啟示即歷史〉（*Offenbarung als Geschichte*；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1, 1963）。

17. 施韋貝爾著，〈潘能伯格〉，頁 177。

書的作品時，也會相應地從這個背景來分析潘能伯格早期思想的形成過程及所展現出的問題意識。

## 二、選編作品及其思想形成

本選集源起的具體因由筆者已在「出版說明」中交待，故在此不贅。要說明的是在客觀原因以外，本文集不僅是一個偶然的湊合，而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潘能伯格早期思想的不同方面。正如上面已提及，以潘能伯格為首的「海德堡圈子」是因着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啟示即歷史》而聲名鵲起的，在這部著作中，潘能伯格指出：「根據《聖經》的傳統，上帝並不直接地啟示他自己（例如，在其『聖言』中），而是間接地透過其在歷史中的作為。」而且「這不是指具體的歷史事件或一連串的事件。這只能應用於歷史的結局，就是所有先前的事件，實質上為整個實在得以被顯明」。<sup>18</sup>明顯地，這裏提出了一個以終末為基礎的歷史神學觀念；再者，一種從歷史而來的間接啟示對於當代的德語學人更是衝着巴特這位神學巨人來說的。因此本書所載由一九五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末的論文，便很能反映出潘能伯格在學界崛起期間思想形成的方方面面。

首篇文章〈救贖事件與歷史〉（*Heilsgeschehen und Geschichte*）在一九五九年發表，與《啟示即歷史》蘊釀於同期，當時潘能伯格仍任教於烏帕塔爾教會大學，據他稱本書所載之譯文段落是海德堡圈子七年以來所關注的重要題目，<sup>19</sup>因此能給我們一個合宜的視點去理解這個神學運動和潘能伯格本人的問題意識。文章一開始便宣

稱「歷史是基督教神學最全面的天地。一切神學問題及其答案，只有在歷史處境中才有意義。」「歷史」在這個神學運動中是個關鍵詞，正如我們在上節已經指出，拉德之以色列歷史傳統神學在當時風靡了許多德國神學人，它有堅固的歷史批判學理基礎，從五經的底本說出發，而潘能伯格更發現這種歷史觀能和當時得令的洛維特與柯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的分析作出比對，並延伸到猶太天啟文學以至是有希臘化背景的《新約》世界作討論，這最終使整個世界歷史的進程成為上帝間接自我啟示的處所，一個可容眾多神學學科學者參與討論的廣泛平台，甚至是讓所有人類眼目都可察看得到的公共視野。

潘能伯格想要強調的是，《聖經》所載之救贖事件在在展現出歷史的性格，以色列人更因在過程中經驗到應許和成就間的張力，構築起其充滿歷史意識的上帝觀念。雖然那要在終末時才完全顯明，卻可在拿撒勒人耶穌的命運中，尤其透過復活事件被預先實現。對於專治系統神學的學者來說，尤為要緊的是潘能伯格在其中找到一條與當時兩大學統（布爾特曼和巴特）不同的「歷史」路線，並牽涉時興之終末盼望題材。一方面，潘能伯格不認同布爾特曼和戈加騰之觀點，以為神學不應建基於歷史的可靠性之上，而僅能着眼於個體之「存在的歷史性」（*die Geschichtlichkeit der Existenz*）。另一方面他也不滿於巴特之源初史（*Urgeschichte*）觀，把救贖歷史和真實歷史二分而僅把焦點放於前者之上。這兩種做法在進路上雖各有特色，也產生了德語學界的長期爭辯，但潘能伯格卻指出它們皆讓當代神學駛進了嚴謹學術以外的避風港，致使神學探究與歷史理性無份無緣，更不利於對耶穌基督以至三一上帝之經世作為作出討論，因為救贖的經驗應讓人體會到上帝所創造的歷史就是整全

18. 轉引自同上，頁 179。

19. 參英譯本的引介文，〈救贖事件與歷史〉（*Redemptive Event and History*），載 Wolfhart Pannenberg,《神學基本問題（卷一）》（*Basic Questions in Theology* Vol. 1; trans. George H. Kehm; London: SCM, 1970），頁 15。